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听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一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各项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得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

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1960年和1961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说,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在当时的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

“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风云》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一个美差,因为我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李洪林速写像

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的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上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能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

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

提出“现代迷信”

1978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找些别的理由把这一期《中国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页一页地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不能复生,就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意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1978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黑龙江一个人,他1969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1980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篇篇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

“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立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裡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家和管理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杂志,这还了得!“小学生看《金瓶梅》吗?”这是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

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志。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2000年1月9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善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李洪林 来源:炎黄子孙 有删节)